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社会与文化丛书

#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

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弗雷德里克·巴特 著

黄建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集团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社会与文化丛书

ISBN 7-208-05405-3



9 787208 054059 >

定价 15.00 元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

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弗雷德里克·巴特 著

黄建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 (美) 巴特(Barth, F.) 著; 黄建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社会与文化丛书)

书名原文：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 Pathans

ISBN 7-208-05405-3

I. 斯... II. ①巴... ②黄... III. 部落—社会人类学—研究—巴基斯坦 IV. D735.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223 号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王小阳

·社会与文化丛书·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

——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弗雷德里克·巴特 著

黄建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60,000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5405—3/C·185

定价 15.00 元

# 中文版序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是对 20 世纪中期我所观察到的斯瓦特人的政治组织构成的分析。它既是一份有关一个地区政治生活的民族志资料,同时又是对政治结构形成过程的一种理论阐述。书中对当时斯瓦特地区普遍存在、但在此之前没有人作过描述的政治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分析框架以便对其他各种形式的政治体系进行分析。我把这种理论观点称之为“生成性的”(generative)。在我写这本书的那个时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一直到现在,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时总是把构成一定群体的制度化形式的描述当作是他们首要的工作。与此不同的是,我在这本书中关注的焦点是建立政治势力、地位的过程。政治组织的制度化形式不是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而是该活动的结果。因此,本书重点是研究各种行为者如何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通过这些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实现对别人的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冲突和政治活动。

斯瓦特人用来进行这样一些政治活动的资本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上都是以当地人熟知并认为是有效的文化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父系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庇护人与追随者之间关系的理想内涵、伊斯兰教的神圣与权威,以及政治联盟形成的选项等。但是,这些意

识必须在现实世界中用真实的行为表现出来才有政治意义。因此,必须让其他人知道我在血缘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让其他人看到我对土地所拥有的权利并尊重这种权利,必须获得和分配足够的物质资料来维持庇护人与其追随者之间的互动等等。人们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地位就是他们充分利用这样一些社会资本和谋略的结果。所以,生成性分析不把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是努力去发现它们是怎样产生和不断更新的。

这样一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在书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不必在此再作抽象的赘述:读者可以从本书的讨论中去了解。回顾斯瓦特以及附近一些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这些年来的变化和动荡,我感到这种生成性分析的模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简单来说,从我在那里做田野调查至今五十年里,该地区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事件和巨大的政治变革。斯瓦特河谷地区已隶属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受到了前苏联的入侵、苏联军队与木加哈丁抵抗组织之间的残酷战争持续了许多年;苏军撤走后不久,塔利班武装从各军阀手里夺过了对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渗透到一部分地区;直到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建立起一个新的、更具代表性的阿富汗政府。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一种论述政治生活的理论观点会有长期的实际效用吗?显然,任何一个代表某个特定时代和地区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的模型都只适合该时代和该地区。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一个地区的思想和行为背后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希望我所提出的生成性分析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透过表面的现象,看到那些持续时间较长的特征。在此,我想用两个方面的特点来说明这一点:联盟构成的内在动因和人们对伊斯兰的神圣与权威的遵从所带来的政治效应。



## 政治联盟的构成

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阿富汗的领土都是控制在所谓北方联盟和塔利班政权手里。双方的军队都是由部落军阀的联盟构成的。随着塔利班所支持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出现,想要赶走基地组织的国际势力就选择了支持北方联盟,并开始轰炸塔利班的军队。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为塔利班而战的军阀会选择投降呢,还是疯狂而顽固地抵抗外国军队和北方联盟?根据我对20世纪50年代斯瓦特地区联盟构成的内在动因的分析,我断言当那些跟随塔利班的部落军队面对巨大的外来压力的时候,他们肯定会选择投降,加入到北方联盟中去,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我所料。因此,几十年前对斯瓦特地区政治的生成分析仍可以用来说明影响在新的条件下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政治活动的过程。我作出这样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呢?

在本书第九章,我讨论了斯瓦特地区的联盟以及最终形成覆盖整个斯瓦特谷地两个对立而分散的政治集团的过程。在书中我用例子说明,这两个集团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两党制政体的初级形式,而是各地方派别之间联盟的自然结果。每一个派别都认为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潜在的朋友。书中的分析还进一步说明这样对立的集团是怎样长期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的。这种平衡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去追求或合作的结果,而是各地方首领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去结成联盟的自然结果。每一个首领都不断寻找机会与外地的人结成联盟以对抗本地的竞争对手。

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很多人类学界的同行对书中的这些发现表示怀疑,因为我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况与大家熟悉的、以父系血缘为基础而裂变出来的各种群体组织的模式完全不一样。虽

然在斯瓦特地区血缘对于确定一个人的身份、机遇和社会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联盟身份。这种身份完全是以现实生活目的为基础来确定的。因此,政治联盟的内在动因既非来自于原有的政治体系,也非来自于相互对立的政治意识。这些都是当代阿富汗政治联盟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特征。在那里各种派别经常变节,昨天的敌人今天可以自由地加入新的联盟,根本不在乎最近参与过的联盟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原教旨主义性质的等等。所以,在斯瓦特地区民族志基础上提出的生成模型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用来说明,甚至预测阿富汗政治的内部动因。

### 宗教头人的政治角色

斯瓦特地区的研究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所起的作用。简单地说,对伊斯兰的神圣与权威的遵从是最基本的和有价值的思想——这一点在很长时间以来和在很多地区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思想怎样与政治发生关联则取决于各地方首领之间竞争的内在动因。仅从当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来寻求解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理解各种不同的地方行为者是如何利用宗教思想及其他资源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的。

斯瓦特地区宗教头人在政治中的角色问题主要在本书的第八章中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具有“米安”身份、自称是穆斯林圣人后代的人是如何利用人们对伊斯兰的尊重来获得政治势力的。人们对伊斯兰的尊重与虔诚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思想意识,但它不是惟一的,并没有为所有的权威和领导地位提供必



然基础。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不是看重神圣与神性,而是把士兵看作是偶像、是勇敢和斗争精神的化身。因此,圣徒在政治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主要是充当调停者和宗教法令方面的专家,而部落首领则充当斗士和土地所有者来行使权力。斯瓦特的模式表明这两种角色在政治活动中是相互补充的:每当有一个圣徒出现,请求和解与让步的时候,一个首领就有更多机会来表现他的勇武和无敌;而首领们越是凶猛和好斗,他们就越能给作为调停者的圣徒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圣徒们在政治活动中还可能有另一个角色,那就是毛拉/法奇尔的角色(有神灵附体的托钵僧,虽然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毛拉是用来指管理当地清真寺的人)。在当地类似种姓的等级体系中毛拉只是处于中等地位,用男子、武士精神来衡量的话,毛拉的声誉并不怎么样。但是他们有能力调动很多人来参与衰战,抵抗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军队(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叫“疯毛拉”)。这样的角色各派系的首领和善于讲和的圣徒都不便于来承担。

在阿富汗,共产党发动的政变和苏联占领之后所发生的起义都是由首领和武士阶层的平民来扮演主要角色的,圣徒们都成了次要的人物。世俗的和像首领一样的领导人崇尚武士精神,并且由于他们有穆斯林和西方给他们提供武器和其他有价值的物资供应,他们不需要那些灵魂附体的流浪毛拉来发动全面号召。另一方面,圣战的口号又为抵抗组织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这就更进一步削弱了政治领导人企图通过宗教权威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机会。

换句话说,斯瓦特模式表明阿富汗全国性的抵抗苏联占领活动与整个中东地区大量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多少关系,虽然很多人对其外部形式是这样解释的。只是在苏联军队撤离,许多

参与抵抗的士兵变成不同军阀的附庸以后,像奥马尔毛拉这样的圣徒和他的塔利班才时来运转。由于有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分子作为惟一支持他们的外部力量,而且他们把反对军阀的过度压迫作为他们的神圣使命,所以,塔利班能突然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是尽管人们普遍赋予伊斯兰教永恒的价值(正如我在斯瓦特分析中所预言的那样),支持新原教旨主义政治势力长期联盟的人并不多,更没有人会支持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重大变革,因为这样做与更广泛的尚武精神相冲突。这样,过度膨胀的塔利班激情动摇了他们的长期目标,并为其他政治联盟的出现提供了空间。毫无疑问,随之而来的将是更进一步的变化。

所以,本书对20世纪50年代斯瓦特地区的分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这种范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其他的事件,探索其他更广泛地区的政治过程。通过把政治组织的外在形式看作是可以观察到的政治过程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去发现和比较那些外在的制度形式,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分析体系并用它去研究政治的变化、转化及其内在动因。为了避免误解各种外在的形式和孤立的事件,我们需要某种观点以便研究动态的政治并建构起能够说明各种体系产生的生成模型。《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分析。

弗雷德里克·巴特

2003年1月 写于奥斯陆

# 前 言

■ 1

本书对巴基斯坦西北部边陲省份斯瓦特谷地的巴坦人社会的某些方面作了描述。除了少数地方引用别人的材料外,绝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以作者本人在 1954 年 2 月至 11 月亲自收集的材料为基础写成。那次田野调查是在挪威王国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完成的,对材料的分析又是在温纳格兰博士奖学金(Wenner Gren Pre-Doctoral Fellowship)的帮助下完成的。

奥斯陆大学的莫根斯田娜(Morgenstierne)教授在我开始田野调查前一年里的耐心教导使我在到达斯瓦特后很快就能够说普什图语并开始用它进行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刚开始调查的两个里,我的翻译阿依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斯瓦特的 H. R. H 瓦里,他对这项研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同时还要感谢他手下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那位在方方面面给了我很多帮助的秘书长。但是如果没有许许多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巴坦人的热情款待,他们的帮助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成了我的朋友,通过他们的解释和实例,我才对他们的社会有所理解。我特别要提一下我的生活助手卡什马力。为了维护他自己和他的主人的名声,他耐心地教我各种礼节,给我讲我所碰到的那些人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友好关系和仇恨,使我能够成功地与其他人相处,同时增加了我对那个地方的了解。

前 言

在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奥斯陆、伦敦和曼彻斯特的朋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剑桥大学人类学学院的师生在近两年中给了我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指教,他们多次与我交流,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本书基本上与我的博士论文《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组织》是一样的。

弗雷德里克·巴特

1957年 于剑桥



#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1 导论 [1]

2 斯瓦特的生态环境与民族志概况 [7]

3 组织的基本结构 [19]

4 邻居、婚姻和宗族关系 [44]

5 不平等的关系与权力 [60]

6 土地的租赁和地方群体内部的政治关系 [92]

7 首领的权威及其追随者 [102]

8 圣徒的权威及其追随者 [133]

9 联盟与政治集团 [151]

10 斯瓦特国的历史和组织 [184]

11 结论 [193]

附录 仇杀案例 [197]

参考书目 [202]

译者后记 [207]

# 1 导 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斯瓦特的政治体系进行描述性分析,重点是对政治权力以及行使这些权力的组织形式进行分析。政治体系曾被描述为“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使用或可能使用强制手段来有组织地实施绝对的权力以维持或建立社会秩序的体系”(拉德克利夫·布朗,福特斯和伊万斯·普里查,1940, P. XIV)<sup>[1]</sup>。但是在斯瓦特,所谓的强制力或强制力的威胁在很多关系中表现为一种惩戒(sanction),而权力的地位是靠其他的惩戒和力量来支撑的。沙沛拉(Schapera)在对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定义进行评论的时候说:“在研究政治组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必须对一个社团的领导阶层以及领导者的全部功能(和权力)的整个体系进行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各种宗教仪式或者集体狩猎或者财富的集中与分配等组织活动与行政上的管理具有同样的功能,在进行比较的时候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沙沛拉,1956, pp. 218—219)。

更重要的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定义并非对斯瓦特巴坦人的组织的各种层次都同样适用。在斯瓦特,有些小群体内部的确是通过强制手段,靠绝对权威来维持内部秩序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秩序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线,也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机构来实施强制性的惩戒以维护这样的社会秩序。那里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是各个更小群体之间互动和对

立的自然结果。

2 ■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政治体系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是很多缺乏超越宗族性组织之上的更大社会控制机制的地方常见的特征(见 Fortes, 1953)。虽然斯瓦特的组织形式与这一类型的组织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分析中所衍生出来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目前要分析的案例。

要对这样一个更广泛的体系进行分析,我们需要对那些更小的群体及他们的内部权力体系有所了解。这些群体在结构上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小群体吸收新成员在形式上都是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在很多对各种部族进行描述的人类学著作中,我们总有那么一种印象,即政治上的从属并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每一个个体一生下来就处于某种结构的某个位置上,因此,在政治上他就自然从属于某个群体或某个主宰者。在斯瓦特,人们通过一系列选择在政治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很多的选择都是暂时的或可以更改的。

这样一种选择上的自由从根本上改变了各种政治机构运行的方式。在那些没有选择的体系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只有通过集体个人的地位才能得到保护或改善。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可能随意地架空和动摇集体行为,个人利益导致了一些不利于集体利益的行为,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政治上的好处做出计划和进行选择。从这一点上来说,斯瓦特人的政治生活与西方社会颇为相似。在斯瓦特,很多政治上的活跃人物都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分得很清楚,一旦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斯瓦特任何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只要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他们就会中断与该群体的关系而投靠到另一个群体中去。

因此,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和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方面来说,权力体系是通过一系列持续不断的个人选择来建立和维持的。

这就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斯瓦特的政治体系看作是个人对归顺别人所作出的全部选择的总和,对他们所具备的各种选择模式和可能性以及他们作出选择的出发点进行描述。但实际上他们选择的出发点是是不可能观察到的。一个基本类似但更方便的方法是调整关注的焦点,根据政治领导者的可观察到的行为来对体系进行分析。这一方法来自以韦伯(1947)为首的理论家的基本思想。韦伯分析了合法性和法庭的基本原理,他把政治活动看作是某种为达到一定目的而组织一批支持者的功能性结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里,个人的从属并不是某种给予群体的东西,而是个人之间交易和选择的结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力和联盟是由领导阶层通过一系列系统的交换而建立起来的。这一观点比较接近巴坦人的观念,他们把上层人物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互惠但又有所不同的契约关系。因此,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要去研究在斯瓦特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人们通过系统地操纵这些关系来建立自己的权力地位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政治组织群体。这样一种分析形式的好处在于有关的数据都包含在可观察的行为中。

弗斯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区别也可以用到这一分析中来。现有的组织是一个多样性选择的结果,社会的某些结构特征(我在此把它称作“框架”)有助于定义和限制为每一个行为者提供的各种选择。

在对该地区的生态和民族志情况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之



后,我将进一步对该社会的框架形式、亲属和邻里关系的网络结构以及暗示着双方之间某种主宰与从属形式的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s)进行描述。在这一背景之下,我还要描述以单个领导者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基本政治群体,最后要描述的是这些领袖人物和群体之间如何联合成一个更大的政治体系。

所以,这一描述采取的是不断综合的形式。其论点及材料归纳如下:

虽然一个人的权力关系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但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地位的某些方面是与生俱来的和根据居住地区而固定了的。每一个个体都同时置身于几个不同的正式框架内,即地理上的区域、次区域、村庄和行政区以及大致由十个主要的、按等级排列的、世袭种姓构成的社会阶层体系。此外,只有拥有土地的巴克图(Pakhtun)阶层的成员才能被授予正式公民资格,这些人是所有其他来自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的政治庇护人(political patrons)。巴克图人的父系家族群体又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第三个框架,因为作为这些父系家族成员手下的政治附庸,非家族成员也被安排到各种相互联系的位置上。在构成一个社会的各个家庭之间有一张由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编织成的关系网,每一个人都被安排到这张在村里人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的某个具体结点上。这个结点是一个人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的结果,是通过婚姻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

但是,在上面提到的正式框架或地方性人际关系网中,没有任何一个结点能够表明一个人是否从属于某位政治领导人或者主宰其他某个人<sup>[2]</sup>。所有能表明主宰关系的都是具有契约或自愿性质的二元关系。这样一些二元关系就是权力体系得以建立的基本因素。这些权力因素在巴坦的日常生活中表现非常明显——它们都是行为者概念化了的东西。这样,每一个人都能